

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期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实践探索

耿步健, 杨雪宁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期,乡村生态治理面临自然脆弱性与社会脆弱性的双重制约,如何构建具有韧性、协同性与可持续性的治理模式,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党建引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在乡村生态治理中发挥着政治引领、组织动员与资源整合的关键作用。基于党建引领的核心视角,系统梳理其在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期乡村生态韧性治理中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从“为何引领”与“何以引领”两个维度阐释党建引领的内在逻辑,认为政治逻辑确立了治理的价值坐标,组织逻辑提供了运行的载体支撑,治理效能转化实现了引领的实际成效。同时,剖析当前实践中存在的组织设置与治理理念的系统性适配尚需加强、基层生态治理队伍能力建设仍需强化、多元协同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考核评价体系需进一步适应生态韧性治理要求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从优化组织设置、强化能力建设、创新协同机制和完善评价体系四个层面提出系统性优化路径,努力为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乡村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生态文明; 党建引领; 生态韧性治理; 美丽乡村

中图分类号: D26; X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6)04-0396-11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60703392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in Rural Ecologic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during the Critical Perio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Geng Bujian, Yang Xuen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a critical pha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ur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faces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natural vulnerability and social vulnerability. Establishing a governance model characterized by resilience, synergy, and sustainability has become an urgent practical challenge that requires resolution.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as a distinctive advantage of the socialist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rur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through political guidance,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收稿日期: 2026-07-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5AKS025)

第一作者: 耿步健, 男, 教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E-mail: 172285837@qq.com

core perspective of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ts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within the context of rural ecologic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during this critical perio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t elucidat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from two dimensions—“why lead” and “how to lead”—arguing that the political logic establishes the value framework for governance, the organizational logic provides the operational found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ranslates this leadership into tangible outcomes. Meanwhile, the paper identifies several prominent issues in current practice, such as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alignment betwee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governance concepts, the necessity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grassroots ecological governance teams, the requirement to further refine diversified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need to alig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s with the demands of ecologic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Building on this analysis, the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pathway encompassing four dimensions—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strengthening capacity building, innovating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advancing ru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ecologic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beautiful countryside

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而生态韧性治理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之一。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24}这为我们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其中,生态振兴的关键在于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系统性与前瞻性。按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生态韧性治理理念的要求^[2],传统以被动应对为主的生态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生态风险,亟须向生态韧性治理转型。“生态韧性治理是指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通过系统性、动态性和适应性的制度与政策设计,提升生态系统应对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人类活动干扰等的能力,从而促进生态功能整体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治理范式。”^[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我国资源压力较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国情没有改变,环保历史欠账尚未还清,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3]277}这就需要全面推进包括乡村在内的生态韧性治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政治引领、组织动员与资源整合的关键作用。早

在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加快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步伐,……共同把祖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好、保护好。”^{[3]54}这为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学界对生态韧性治理的研究已形成丰富成果,其中有学者指出生态韧性治理的实践中存在着“尚未形成高效互动和责任共担的韧性治理格局”“各自为政”^[2]等现实困境。该研究虽然未明确提及党建引领,但其困境隐含着治理中权威统筹与组织动员能力的缺失。与此同时,有学者在对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考察中进一步指出,创新推进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在于“把生态理性建构作为重要路径”^[4],而这一建构需要“遵循党建激活和找回群众、再组织化和韧性治理、政策优化和共治认同之逻辑”^[4]。这就直接将“党建”与“韧性治理”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即党建通过激活群众、再组织化来生成韧性治理能力。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在对乡村治理有效机制的考察中发现:党建引领是一种兼具统筹与动员功能的核心机制,能够通过“群众动员”与“组织建构”^[5]两种策略,“持续形塑乡村治理有效的韧性机制”^[5]。上述研究为思考乡村生态韧性治理提

供了重要启示:既然党建引领已被证明能够在乡村治理中生成韧性机制,那么它能否以及如何作用于乡村生态韧性治理这一同样面临“协同不足”与“主体缺失”困境的具体场域?然而,现有成果大多将党建引领与生态韧性治理作为两个独立议题分别讨论,对二者内在关联的专门研究尚不充分,缺乏对党建引领生态韧性治理内在逻辑的深入阐释,更缺少对其现实困境的系统剖析和优化路径的整体构建。以浙江安吉为代表的一些地区虽已率先探索出党建引领生态治理的有效路径,但其成功经验能否在更广范围内复制推广,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本文尝试从党建引领的核心视角出发,在阐释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尝试提出系统性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内在逻辑

生态韧性(ecological resilience)是指生态系统在遭受外界干扰和冲击时,维持其核心结构与功能正常运转,并通过自我调适恢复稳定状态的能力^[6]。我国于21世纪10年代开始将韧性理论引入治理领域。所谓韧性治理(resilient governance),是指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能够通过灵活调整、多元协同和持续学习,维持治理效能并实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7]。基于生态韧性与韧性治理的核心内涵,笔者提出:“生态韧性治理是指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通过系统性、动态性和适应性的制度与政策设计,提升生态系统应对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人类活动干扰等的能力,从而促进生态功能整体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治理范式。”^[2]而乡村生态韧性治理(rural ecological resilience governance)是上述概念在乡村场域的具体应用,正如有学者曾指出的:乡村在面临生产发展转型困境、生活设施建设与运行障碍、生态环境治理统筹不足等风险冲击时,通过多元治理手段动态调整乡村生产、生活与环境因素,进而适应、吸收风险,逐步恢复乡村生态宜居功能、实现乡村生态振兴^[8]。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韧性治理观”^[2],其中一点就是: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有效推进,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基层党建的引领。在我国乡村治理实践中,党建引领凭借其独特的功能优势和制度保障,成为推动乡村生态韧性治理有序开展、破解生态治理难题的核心力量。从学理层面审视,党建引领赋能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作用,不只是单一方向的政治统筹协调,其整体运行逻辑可以围绕“为何引领”与“何以引领”两条相互关联的逻辑线索展开。前者回答党建引领的价值指向与目标定位,是党建引领的核心前提;后者揭示党建引领得以落地的结构支撑与运行机制,是党建引领的实践保障。二者共同构成理解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为何引领:政治逻辑的确立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7}。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更是将党的这一历史主动落到实处的具体映照。政党作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其组织体系的基础——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同样发挥着“党的全面领导”的“末梢神经”作用,具有“全面领导乡镇、村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9]162}的职责,是政党稳固根基的重要保障,也是大力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美丽乡村的根本保证。

从现实需求来看,随着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国家构建的重要基石,不仅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209}理念的关键场域,更是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主战场。然而当前,农业农村自身发展相对滞后、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薄弱、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滞后、乡村生态资源优势未充分转化等生态领域短板相互叠加,加之技术在生态韧性治理中的应用不足,共同削弱了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制约我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格局的突出瓶颈。摆脱这一困境,关键在于加强基层党建引领,以及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制度优化与效能提升,而这一判断正是建立在党中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之上。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1]274}。乡村生态韧性治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乡村振兴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生态韧性治理的成果中。为此,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突出生态韧性治理的实践内涵,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明确将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核心抓手,通过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生态韧性治理中把关定向、出政策、做决策的作用,把“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转化为具体行动,既依托平台整合生态资源,推进农村生态修复、污染协同治理、绿色生活方式培育等工作,提升乡村生态韧性治理效能,又以党建引领绿色产业发展和生态宜居环境建设,切实回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治理成果共享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政治逻辑的核心在于为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这回答了党建引领“为何必要”的问题。正是因为以生态韧性治理为重要内容的生态文明建设关乎民生福祉与美丽中国建设国家战略,必须由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来统筹引领。

(二)何以引领:组织逻辑的支撑

如果说政治逻辑为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建设乡村生态文明明确了坐标与方向,那么要将这一坐标与方向转化为看得见的治理成果,就离不开扎实的实践条件和完善的运行体系。党建相关工作的稳步落地,依托于组织逻辑的有力支撑,从整体架构搭建、各类资源统筹整合的角度,梳理出党建引领可以落地执行的具体方式,共同解决党建引领“如何实现”的核心问题。

站在我国公共政策推动的层级性视角来看,党建引领的组织逻辑首先体现在其高位推动的治理特征上,这一治理特征与生态韧性治理对“系

统性统筹”“风险前置应对”的核心需求高度契合。党组织具备自上而下的政策传达条件以及跨领域跨部门协同协作的优势条件,可以顺利突破乡村治理中各类资源相互隔绝的局限,能够把优美生态环境建设的发展规划,充分融入基层治理的日常环节之中,为生态韧性治理提供了稳固的组织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乡村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生态韧性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建引领的组织逻辑进一步体现为其作为资源整合的核心枢纽作用。针对乡村内部的资源整合工作,基层党组织凭借自身独特的组织优势,精准贴合生态韧性治理的现实需求,系统梳理乡村内部分散的人力物资、信息资料、实用技术等各类要素,加快各类治理资源的流动速度,提升资源利用的集约化水平,让零散资源充分转变为推动生态建设的有用力量。在衔接与引入外来优质资源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还能发挥其互通衔接的桥梁价值。这就是说,伴随治理重心不断下沉、社会优质资源持续向乡村区域倾斜的发展趋势,基层党组织可以主动扛起外部资源对接引进的工作职责,持续引入智能管理平台、现代化设施设备、专业人才智库等现代化治理要素。然而,资源的高效整合与长效供给离不开制度体系的规范与保障。为此,党组织着力推进标准化建设,促进党建工作的规范化运行,并建立健全多方联动的帮扶机制,为资源的持续注入与合理分配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撑。而制度的有效执行,最终又依赖于一支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因此党组织围绕党建引领生态韧性治理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在综合能力提升、专业知识积累、基层实践锻炼等多个方面有序开展基层干部的培养工作,确保组织逻辑与治理能力能够持续为乡村生态韧性治理注入动能。

综合来看,从政策内容的逐层落地、本土资源的统筹整合,再到管理制度的完善优化、干部队伍的长期培育,党组织的组织逻辑可以完整覆盖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全部流程。党组织既能完成各类治理资源的统筹规划与合理分配,也能主导整体治理体系的搭建完善与方向引领,能够为政治逻辑的落地执行,打造稳固可靠的组织依托。

(三) 引领何为: 治理效能的转化

如果说组织逻辑解决了“何以引领”的路径问题,那么治理效能转化则回答了“引领何为”的效能问题,即党建引领能够发挥哪些实际作用的现实问题。这就是说,效能转化能够明确党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达成的具体工作目标,也能把政治逻辑自带的价值导向和组织逻辑具备的结构优势,全面转化为看得见、可落地的基层生态韧性治理实效。

在推进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过程中,效能转化首先体现为对生态文明建设价值方向的校准。正如现有研究所揭示的,治理过程中存在“生态伦理失范”^[12]等潜在风险,若缺乏价值引导,容易削弱治理的成效。这一警示在乡村生态韧性治理中具有现实针对性。而党建引领通过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嵌入治理的全流程,从价值层面为各项工作划定边界,明确最终目标是保障所有村民的生态权益,而非单纯追求指标达成或治理速度,确保各项措施始终服务于提升生态韧性、建设美丽乡村、回应民生需求的根本目标。

治理效能转化还体现为价值引领与技术工具的深度融合。依托党建引领,这一融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党组织将绿色发展、生态共建共享等治理理念,转化为技术工具应用的具体规则与边界,例如,在引入智能监测设备与环境预警系统时,明确其服务对象是全体村民的生态安全,而非单纯的行政考核指标,确保技术应用不偏离公共利益导向;另一方面,技术工具的应用又反向强化了价值的可检验性。数据平台的实时公开、预警信息的精准推送,使村民能够直观感知生态治理的进展,并将“共同参与”理念转化为可监督、可反馈的日常实践。党建在这种双向融合中发挥统筹作用,既主导技术工具的引入方向,也确保技术逻辑始终服从于政治逻辑,从而实现生态治理效能从碎片化向系统化的整体跃升。

综上所述,政治逻辑确立了“为何引领”的价值坐标,组织逻辑提供了“何以引领”的运行载体,治理效能转化实现了“引领何为”的实际成效。三者彼此衔接、层层关联,共同构成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内在运行逻辑。这条完

整的逻辑脉络,可以搭建起清晰的分析框架,从而深入理解党建引领在乡村生态韧性治理中的特殊价值与核心作用。

二、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现实困境

当前,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在组织建设、效能提升等层面均展现出了积极的成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但也要看到,生态韧性治理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和跨区域性的特点。这类治理模式要求自然生态系统既拥有抵御短期外部冲击的能力,又具有适应长期环境变化的能力;既重视提升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恢复力,又强化社会系统的动态学习与调适能力。按照生态韧性治理的特点去审视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层实践,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在全国范围内仍有需要关注和完善的方面。

(一) 组织设置与治理理念的系统性适配尚需加强

乡村生态韧性治理致力于维护我们所处的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安全健康与良性循环,对应的治理范围常常突破单一行政村的地域界限,会把流域水系、山地林区、连片林地等完整生态区域全部纳入管控范围。现阶段,乡村基层党组织大多按照行政村的划分标准进行布局设置,这种组织布局与生态治理跨区域、一体化的空间需求之间衔接不足,又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理念适应不够,因此容易产生一些结构性问题。

一方面,传统组织设置难以完全覆盖跨域生态治理需求。随着生态保护范围扩展和农业产业链延伸,“一些新的不断延伸的农业产业链的基层党组织设置仍然存在空白点”^[13],部分跨村的生态廊道、流域治理、山林保护等关键环节的党组织设置尚未完全跟进。以黄河临夏段为例,该河段兼具水源涵养、农业生产、城乡供水多重功能,生态治理需要统筹全域水资源、水环境与水生态管护。然而治理主体呈现碎片化特征,跨区域联合党组织尚未有效建立,难以统筹协调沿岸治理诉求^[14]。由此可见,基于行政边界建立的党组织属地设置模式,在跨域治理场景下存在治理

覆盖衔接不足、协同联动载体相对有限的客观情况,使得基层党组织在处理跨界生态问题时,容易遇到“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治理难题。

另一方面,碎片化思维与系统性治理要求之间需要更好地协调。部分基层党组织对生态韧性治理的系统性认识不足,仍习惯于运动式的环境整治方式和碎片化的项目推进模式,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139]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加之生态要素具备跨区域流动与空间外溢特性,生态环境治理无法局限于单一行政村行政范围,需以流域、连片生态单元为整体构建“府际协同机制”^[15]。新安江流域治理难题便是典型佐证,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上游的发展问题和下游的水质问题不同步”^[14],两类治理目标难以同步协调,本质是治理主体对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关联性的把握有待深化,导致生态环境治理措施之间协同不足。组织设置上的布局特点,叠加部分治理主体系统思维不足,共同提示我们需在组织设置和治理理念上持续优化。这表明,单纯更新治理理念不足以化解跨界治理难题,亟需同步创新党组织设置形式、搭建跨区域党建联动平台,持续夯实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组织基础。

(二) 基层生态治理队伍能力建设仍需强化

乡村生态韧性治理是一项全周期、专业化、系统性的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要求乡村基层治理主体具备风险识别、预警响应、修复恢复与经验转化的综合能力,对党员干部的生态素养与生态文明建设专业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当前,部分乡村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在年龄结构、专业能力、人才引育等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生态韧性治理的现实需要,这已成为影响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效能提升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年龄结构来看,党员队伍老龄化现象需要重视,部分村庄存在创造力不足的情况^[16]。湖南Z村的调研显示,该村60岁以上党员占比高达74.4%,50岁以下仅占16.9%^[17]。并且许多农村党支部书记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对新生事物接受较慢,在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韧性治理方面力不从心;与此同时,年轻

党员外出务工比例高,农村“空心化”导致胜任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人才相对短缺。

从专业能力来看,部分干部对生态修复、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文明建设专业知识掌握不够系统,在承担技术密集型的生态韧性治理工作时存在一定困难,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客观上要求配备兼具专业技术素养与系统统筹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正如相关研究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只有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才能在乡村振兴中起到引领的作用”^[16]。更需要关注的是,由于专业判断能力有待提高,个别基层干部在生态决策中可能受到短期利益影响,需要进一步提升决策的科学性。

从人才引育来看,乡村专业人才引不进、留不住问题仍较突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并提升其效能,需要建设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18]22}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乡村地区工作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在“基础设施建设、卫生保障医疗、子女入学教育、社会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配套娱乐资源”^[16]等方面短期内难以突破发展困境;另一方面,“人才发展的需求得不到满足”^[16]。即便引进了少量专业人才,也往往因为缺乏职业发展空间和继续教育机会而难以长期稳定。这种人才方面的情况,导致在面对突发环境污染、生态灾害等风险时,党组织的应急响应和韧性恢复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最佳治理时机的把握,生态治理效能尚有提升空间。

(三) 多元协同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乡村生态韧性治理本质上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过程,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村民形成治理合力。然而,当前协同机制运行不够顺畅,党建引领的粘合剂作用还需进一步发挥,各方力量在协同联动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首先,政府部门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业务孤岛现象。“地方政府数据治理在治理体制、治理规则、治理主体、治理效能等方面均存在协同不足的问题。”^[19]在实际工作中,各部门往往依据各自的职能边界开展生态治理,统一规划和统筹协调能力有待加强,“导致资源共享、问题共商缺乏持续性,‘联而不动’‘动而不深’现象

普遍存在”^[20]。例如,水利部门负责河道治理,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水质监测,但由于信息共享不充分、行动协同不顺畅,容易出现“水利部门清淤、农业部门施肥、环保部门监测”的治理局面,难以形成生态韧性治理合力。

其次,政民之间的生态治理互动存在一定的“技术鸿沟”与信任问题。部分村民对数字化的新型治理工具适应性不足,产生“技术鸿沟”,致使老年人、流动人口等群体易因线上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造成“数字排斥”^[20],使得该类群体参与生态治理的意愿有待激发;部分村民认为生态治理是“政府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环保意识尚需提高。调研显示,“由于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有387个村不同程度地存在生活垃圾、生活用水随意倒泄,化肥、农药超量使用等情况”^[21]。同时,基层党组织在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方面,尚未找到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方法,群众的内生动力有待更好激发。

最后,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充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社会组织的公益动员能力,尚未通过有效的党建纽带和政策引导,被系统吸纳到乡村生态治理体系中。原因主要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差距较大,相互协调不到位,二者之间协同度较低。”^[2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1]331}然而实践中“政府干、群众看”的状况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这与生态韧性治理所要求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共同体的目标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四) 考核评价体系需进一步适应生态韧性治理要求

乡村生态韧性治理是一项长期性工程,其成效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公共性特征。但现行的考核评价体系在适配这种治理特征方面,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既存在短期政绩导向与生态长效发展需求之间的不协调、配套激励机制供给不足的现实情况,也尚未建立起完备科学的生态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一方面,政绩考核的短期化与生态治理的长效

化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在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地区,“重经济、轻生态”的思维惯性依然存在^[22],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在任期内出政绩,倾向于将资源投向能快速产生GDP和税收的工业项目,而生态基础设施和长期保护投入则被置于次要位置。此外,现有制度框架尚存短板,“虽然我国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生态治理机制,但缺少相关的激励制度”^[2],激励机制缺位容易引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不力”“绿色转型动力弱”^[2]等问题。考核导向偏差与激励机制缺失形成双重制约,使得基层党组织和干部推进生态韧性治理的内生动力有待加强,容易出现“检查时突击整治、检查后反弹回潮”的运动式治理现象。

另一方面,科学的生态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尚在构建之中。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考核大多依托水、大气、土壤等单一环境要素指标,这类指标虽然直观易懂,但“无法对其他环境要素及体现综合性视野的环境区域、环境系统开展评估”^[23],难以把握生态韧性的核心内涵,也就是生态系统遭受外部扰动时的抵御能力、恢复速度与适应水平。例如:部分区域森林覆盖率指标表现优异,若林区树种单一、群落结构简单,生态韧性往往偏弱,遭遇病虫害便容易出现大面积退化;而群落内包含多种功能相近树种时,即便某一类树种受虫害影响衰退,其他物种仍可维持生态系统生产力稳定,依靠功能冗余提升系统韧性^[24]。此类潜藏的结构性脆弱风险,依靠现行考核体系难以有效识别。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9]290}。然而现阶段尚缺少一套可量化生态韧性的科学指标体系,党建引领生态治理的实践成效难以精准衡量,“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困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进而对党员干部的治理积极性和创造性产生一定影响。

三、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破解路径

针对上述乡村生态韧性治理中的各类现实困境,安吉等地依托“两山”理念推进生态治理的

实践经验足以证明,推动党建引领与生态韧性治理深度融合是破解乡村生态韧性治理难题、筑牢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根基的重要路径。具体来说,其实践推进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以提升乡村生态韧性、建设美丽乡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核心目标,从组织嵌入、能力建设、协同共治、制度创新四个维度构建系统化、长效化的生态韧性治理机制。

(一) 优化组织设置,实现党组织与生态治理空间的深度嵌入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25][11]}。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覆盖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影响党建引领的效果。针对组织覆盖与治理空间的错配问题,应创新党组织设置模式,推动党的组织网络向生态治理的关键节点延伸。第一,探索“‘跨村联建’党建模式”^[26]。根据生态治理的实际需要,在“跨村联建”的生态保护区、农业产业园区、乡村旅游联合体、重大生态工程项目指挥部等建立联合党组织或功能型党组织。借鉴福建龙岩永定区“跨村联建”的经验^[27],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前提下,以强村带弱村,在生态保护区、乡村旅游联合体、农业产业园区等建立联合党总支,构建“党总支+党支部+社会组织”联席会议制度,推行“统一规划、连片建设、共享共用”机制,从而实现跨域生态治理的组织协同与资源整合。第二,在新型经营主体中延伸组织覆盖。新型经营主体同样是生态韧性治理的重要主体,组织建设同样需要严密覆盖新型经营主体。浙江安吉鲁家村的实践表明^[28],将党组织向新型经营主体延伸是实现组织覆盖与产业空间深度匹配的有效路径。该村把村集体作为平台承接外部资源,“原村经济合作社转为股份经济合作社”,“职业农民、职业经理、农民企业家等新型农民成了生产经营的主体”^[28]。这一组织架构将党的组织优势深度嵌入产业发展全链条,为生态韧性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组织载体。第三,强化党组织的生态政治功能,实质上是将“政治引领能力”向生态治理领域的具体延伸。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以提升政治引领能力为根本”,“以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为支撑”^[29],这就要求其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1][323]}纳入基层党组织议

事决策的重要内容,使党组织成为以生态韧性治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心骨。

(二) 强化能力建设,锻造生态韧性治理的专业骨干队伍

针对治理能力与风险应对的水平差距,应以提升党员干部的生态专业素养为核心,打造一支懂生态、会治理、有韧性的生态文明建设骨干队伍。第一,实施生态赋能培训工程。“乡村振兴需要农业人才和技术作为支撑,有效的培训模式能够为技术的获取提供重要保障。”^[30]应摒弃传统单一的培训模式,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修复技术、环境风险防控等纳入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体系,坚持分层施教、按需培训,同时依靠案例教学、现场实训、一线观摩等方式,推动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第二,实施“双培双带”和人才培育工程,压实干部生态韧性治理责任。“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3][124]}能人型村干部“是实现乡村环境善治的重要主体”^[31],对带动群众参与生态保护、落实治理责任具有显著示范效应。通过“双培双带”工程,坚持把生态治理骨干培育成党员、把党员培育成生态韧性治理带头人,构建党员引领、群众共治的良好治理格局。在此基础上,要健全生态治理责任清单制度,细化岗位职责与考核标准,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履职问责。同时在制度层面,紧扣“三个区分开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尽职免责边界,有效化解干部“怕出错、不敢为”的履职顾虑,激励干部在生态治理一线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第三,健全生态智库和科技特派员驻点服务制度,针对基层专业人才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依托该制度,积极引入高校、科研院所生态环境、水土治理、生态修复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项目论证与难题攻坚,弥补基层生态治理技术短板,精准破解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中的技术性难题,全面提升基层生态治理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三) 创新协同机制,构建乡村生态治理的行动共同体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韧性治理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秉持生态集体主义理念协

同发力、精准施策、久久为功,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2]针对多元协同与治理共同体的行动分散困境,应依托党建工作作为核心纽带,搭建起一核引领、多方参与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协作体系。第一,搭建党委统筹引领、各部门联动配合、社会各界主动参与的完整治理框架。这符合“韧性治理”所强调的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原则,旨在形成“生态治理责任共同体”^[12]。地方党委发挥整体统筹作用,建立层级完善的乡村生态韧性治理工作小组及常态化沟通议事机制,配套设立专职办公部门,全权负责各项治理事务的沟通衔接与统筹调节;地方治理层面还要整合政府数据治理相关部门职能,制定统一的“数据治理地方标准”与“数据共享责任清单”,并且严格落实各项规则要求,同步打造县域范围内统一运行的“数据资源平台”^[19],有效打破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隔阂与工作壁垒。第二,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持续推广生态议事交流会、环境圆桌会等民主沟通形式,充分保障基层村民对各类生态建设项目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第三,搭建社会化的参与平台。基层党组织可以主动对接本地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等组织,依靠党建合作联盟组建、城乡共建协议签订、基层党员专家服务站点设立等多元方式,合理引导社会资金、技术资源、专业人才持续流向乡村生态建设领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发展与党建工作效力的多重提升。最后,还需注重“培育全民共建共享的生态文化”^[2]。“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3176],基层党组织可以扶持乡村本土环保自治组织的稳步发展,充分发挥民间河长、乡村生态守护人员等志愿群体的服务价值。

(四)完善评价体系,建立生态韧性治理的持久动力机制

一套完善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可以持续为党建引领下的乡村生态韧性治理提供动力。生态韧性治理的评价标准不能只局限在经济单一维度,应构建涵盖“理念韧性、结构韧性、制度韧性、技术韧性”^[12]的多维综合评价框架,以引导治理体系向长期性发展。一是设计党建工作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的综合考核指标。要打破以往

只参考经济增长数据或党建书面台账的单一考核方式,制定符合乡村发展现状的多元评价内容。评价内容可以分为过程类指标与结果类指标两大板块:过程类指标包含党组织研讨生态治理工作的频次、基层党员干部参与生态学习与实践活动的时长,以及基层治理问题的实际处理效率等;结果类指标涵盖区域空气环境、水质条件、土壤安全等生态要素的动态变化,生态风险问题的发生概率与应急处置速度,绿色产业在地方经济中的产值占比,以及乡村居民对于居住生态环境的整体满意程度等。治理考核的最终结果,可以直接关联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奖资格以及基层工作经费的拨付额度。二是强化基于数据的动态监测与督查督导。通过利用线上平台对生态保护责任落实、问题整改进展进行全程记录和可视化展示,上级党组织不仅能够完成远程督导检查,大幅减少多层级线下巡查带来的形式主义问题,而且能够针对数据监测反馈出来的突出治理短板,及时开展相对应的督导整改,加快各类生态问题的落地解决。三是加强理论总结与经验推广。鼓励不同地区结合本土实际开展特色化治理探索,系统整理浙江乡村全域规划、安徽田园生态建设等成熟案例,挖掘党建赋能生态治理的可行举措,把零散的实践经验梳理整合,提炼形成具备普遍参考意义的治理规律;同时,要注重总结推广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如浙江“千万工程”中党建引领生态治理的成功实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四、结语

乡村生态韧性治理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既要依靠科学技术与方法的辅助赋能,也要依赖完善的制度约束保障与正向价值理念的思想引导。党建引领作为我国特色治理体系的独有优势,能够在乡村生态建设的全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政治统领作用与组织联结价值。需要注意的是,现阶段党建引领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整体模式,依旧处在持续探索、逐步完善的成长阶段,理论研究内容和基层实践落地存在衔接断层,优质治理经验难以大范围复制套用等现实问题,都会制约生态韧性治理的高质量推进。未来,应

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灵活适应能力,推动各类治理方法和乡村现实场景实现深度融合,搭建跨部门、跨主体、跨地域的协同治理格局,同步构建长期稳定、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价体系;各地还要加强不同发展类型区域治理模式的对比研究,整合梳理差异化实践经验,研发适配不同乡村基础条件、落地性更强的治理方案。依托党建自身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持续为乡村生态建设输送全新发展动能,探索契合我国发展国情、贴合时代发展需求、展现乡村本土特色的生态韧性治理路径,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而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筑牢稳固坚实的发展根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5.
- [2] 耿步健.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期生态韧性治理面临的困境与破解[J]. 探索, 2026(2): 14-27.
- [3] 习近平.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
- [4] 胡世文. 建构生态理性: 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以Y市典型实践为例[J]. 学习与实践, 2025(1): 52-62.
- [5] 姜国俊, 袁赞. 找回群众与双向赋能: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有效的韧性机制——基于C村美丽屋场建设的个案考察[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1): 118-131.
- [6]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 4(1): 1-23.
- [7] 杨立华, 刘华宇, 马壹. 韧性治理: 含义、范式变迁和一个新整合框架[J]. 治理研究, 2025, 41(3): 4-26.
- [8] 王鑫. 乡村生态韧性治理的水平测度与融合发展[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20): 45-50.
- [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11]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12] 耿步健, 李青. 从韧性治理到治理韧性: 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向与实践探索[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55(6): 1-13.
- [13] 余京洋, 员智凯. 党建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4): 24-31.
- [14] 王喜峰, 姜承昊. 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的关键问题及政策进路[J]. 东南学术, 2026(3): 180-188.
- [15] 王遥, 杜春林. ICA 框架下流域生态治理的府际协同机制——以武汉城市圈L湖流域为例[J]. 环境保护科学, 2026, 52(4): 47-52.
- [16] 石金群.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目标、基础与路径[J]. 重庆社会科学, 2024(11): 60-74.
- [17] 张燮.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的实践逻辑与路径探析——以湖南Z村调研为例[J]. 湖湘论坛, 2023, 36(4): 52-62.
- [18]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19] 胡玉桃. 数字化转型视野下的地方政府数据协同治理[J]. 学习与实践, 2021(6): 69-77.
- [20] 刘翠霞, 陈峥嵘. “治理的治理”何以可能与高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逻辑理路、现实梗阻与优化路径[J]. 社会主义研究, 2026(3): 115-124.
- [21] 宋保胜, 吴奇隆, 王鹏飞.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J]. 中州学刊, 2021(6): 39-45.
- [22] 冷成英, 彭智敏.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内在逻辑与量化分析[J]. 江汉论坛, 2025(9): 46-54.
- [23] 陈海嵩, 周旭.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的发展检视与优化[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6): 20-32.
- [24] 刘世荣, 陈远其, 聂秀青, 等. 树种多样性对森林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和韧性的影响[J]. 林业科学, 2026, 62(1): 1-18.
- [25]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26] 陈晓宏.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模式创新——以福建省三明市“跨村联建”为例[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8(12): 46-53.
- [27] 李强. 福建龙岩永定区: “跨村联建”推动党建工作

- 提质增效[J]. 党建, 2022(7): 57-59.
- [28] 韩旭东, 李德阳, 郑风田. 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3): 52-61.
- [29] 霍军亮.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引领农民美好生活研究[J]. 湖湘论坛, 2025, 38(1): 34-46.
- [30] 王瑾, 胡彩红, 胡恩华.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生态农业培训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扎根方法[J]. 江苏农业科学, 2021, 49(23): 22-28.
- [31] 吴伟光, 苗小波, 马荟. 能人型村干部如何促进乡村环境参与式治理——以浙江省三个“千万工程”典型村为例[J]. 世界农业, 2025(2): 31-43.

(责编: 程爱婕)